

经过连续6年的整理、清洗、修复之后，如今，有270多年历史的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经板，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修复基地找到了新家，69410块原始经板，安静而有序地摆满文物库房。以这些经板为母本，用特制的宣纸、按传统雕版印刷方法，刷上“一得阁”特制的墨，就印出了新的经文。新印出的经文，从经板上揭下来，经过针、折页、吹配等十几道传统工序，最后装帧成册。翻开封面时，依然能令人感到文化在这里轻吟浅诵，历史在这里传承有序。

与这些经文的先辈不同，从这些古老的经板身上，不仅重新诞生了80部完整的经文，而且在经过初步的清洗之后，首次生成经板的数字化档案，即独立的“电子身份证”，这一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。

今夏的北京，雨水丰沛，在绵绵小雨中，记者走进修复基地的大门，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经板保护、修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崇起讲述了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经板保护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故事。

清敕修大藏经是什么

大藏经，是佛教经典的总集，简称为藏经，又称为一切经，有多个版本。中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始于北宋开宝，继之，历朝纷纷效仿。清朝也不例外。《清敕修大藏经》又名《乾隆大藏经》或《龙藏》。记者看到的，正是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的经板。

《清敕修大藏经》是在明朝《永乐北藏》基础上编校而成的，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。全书不仅有佛教经典，还收录了元、明、清历代高僧大德的章疏、论著、语录、史传和目录等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天文、地理、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，具有极高的历史、文献和艺术价值。

从修撰时间上来说，《清敕修大藏经》始于清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，当时在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，由和硕庄亲王允禄、和硕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等主持；从雍正十三年开雕，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竣工，雕成经板79036块。全藏724函，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，1669部，7168卷。其中，正藏485函，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漆字；续藏239函，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，内容较《永乐北藏》有所增减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《清敕修大藏经》雕毕以来，在乾隆时期，还经过了三次抽毁、撤出，主要是乾隆皇帝曾分别于乾隆三十年、三十四年、四十一年下旨，共抽毁了800块经板和其对应的近百卷典籍。在这些撤毁的经板中，包括了钱谦益的著作，武则天、明永乐皇帝等前朝帝王撰写的文章等。因此，初雕初印的《清敕修大藏经》，罕见全帙。

“关于乾隆删改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的情况，在经板中也得到了体现，一些经板上的部分内容，有明显地被人铲去的痕迹。”韩崇起说。

2009年，受北京文物局委托，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承接了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经板保护、修复项目。他们想要恢复重印的，便是未经删改过的乾隆初刻初印本。

在白塔寺找到古本经书

煌煌《清敕修大藏经》，一共7168卷，每一页经文都是先刻在经板上才进行印刷。经板用的是梨木，双面雕刻，一部《清敕修大藏经》，需要多少块经板呢？答案是79036块，一块经板重约4.5公斤，放在现在的仓库里，一共码了66排架子，从地板一直摆到天花板，摆得满满当当。

别看现在这些经板排列有序，历史上曾多次更换存放地点。据了解，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，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经板刊竣后，先存放于故宫的武英殿，后因体量巨大，请印不便，全部经板从故宫的武英殿挪至柏林寺。上世纪80年代，经板又从柏林寺挪出，在此后的30多年中辗转多地。最后到这个项目组接手的时候，不仅顺序已被严重打乱，还有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丢失或损毁了。

“经过清点，我们最后发现，经板现存69410块，遗失9626块。现存的经板中，还有1万多块残板，有的长毛了，有的糟朽了，就是说，20%的经板有

夏读书，日正长，打开书，喜洋洋。田野勤耕桑麻秀，灯下苦读声朗朗。荷花池畔风光好，芭蕉树下气候凉。农村四月闲人少，勤学苦攻把名扬。
——民国·熊伯伊《四季歌》 张建华书

张建华，字子建，1974年生于安徽临泉，1992年入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，2000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，师从刘大为、袁武、史国良诸先生。2004年入中国国家画院首届人物画高研班刘大为工作室。200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，师从赵振乾先生，获硕士学位。2012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，师从范曾先生，获美术学博士。目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。

夏讀書日正長，打開書喜洋洋。
田野勤耕桑麻秀，燈下苦讀聲朗朗。
荷花池畔風光好，芭蕉樹下氣候涼。
農村四月閑人少，勤學苦攻把名揚。



有270多年历史,经过6年整理修复 《清敕修大藏经》喜获重印

本报记者 叶晓楠

新印出的《清敕修大藏经》

不同程度的损坏。所有这些清点工作，都是一点点做的。”韩崇起介绍说。

为彻底改善经板保存环境，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按博物馆木质文物标准，兴建了上、下两层近2000平方米的永久性经板专用库房。库房内安装了消防、安防设施，配备了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还为经板量身定制了660个高255厘米、宽80厘米、长120厘米的经板架，使经板能够按序、分层、整齐地码放在经板架上。

与整理和清洗经板同步进行的，是寻找一部完整的初印本。虽然藏有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的寺庙有多座，但年深日久，想要找出一部完全没有损失、而且是初刻初印的经书，并不容易。为此，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先后走访了山西五台山的塔院寺，辽宁沈阳的慈恩寺，江苏苏州的西园寺，湖北武汉的归元寺，北京的广化寺、白塔寺、故宫博物院、国家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以及浙江图书馆等全国著名的寺院及藏经单位。

最终，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采用的经书样本之一，是北京白塔寺所藏的一部经书，这当中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据载，1976年大地震时，白塔寺曾遭一定程度的破坏，后来维修时人们发现，原来白塔寺的塔刹中竟还保存着一部大藏经，而且是初刻初印的版本。当时，那些经书没有书函和封套，都是用牛皮纸严实实地密封着的，但是，由于时间实在太久，有些经书已经变得硬如木块，除非采用特殊手段，否则难以揭开，另外，有些经书还被积水浸泡过。

韩崇起记得，当时，他们找到白塔寺，带着专用的扫描仪，在文物部门和寺院方面的合作下进行扫描，扫描仪都用坏了好几台。

后期，由于扫描中出现了一些褶皱和不清楚之处，另外，还有一些缺失，他们只好继续寻经。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听说，辽宁的慈恩寺藏有一部经书，遂驱车前往，打开一看，其中正好包括了部分缺失的内容。他们大喜过望，由是又补足了一部分缺失的经书。

就这样，这几年，只要听说哪里有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的线索，他们都会直奔当地，反复核对。在对底本做原大扫描的基础上，采用电脑技术对底本进行修版、拼接等数字化处理，并邀请专家研究、论证各版本不同之处，最终确定刻经板所依据的初印本内容。



手工雕刻经板

州等地的博物馆考察学习，请刷印技师到公司进行刷印讲课、示范、培训工人。正式印刷前，他们用雕刻的佚失经板做刷印试验，反复进行刷印练习，探索墨兑水的比例、经板上墨的多少与宣纸载墨的适应性。他们先后试验了20多种宣纸，最后采用了安徽泾县明星宣纸厂生产的宣纸。

2014年底，经板的修复和补刻工作基本完成，开始重印《清敕修大藏经》，他们聘请了故宫博物院等的专家来传授技艺，培训工人，从浆糊的调配，纸捻的用纸，折版的制作，到配页台的位置摆放，再到折页尺寸的统一，循序渐进地进行指导，最终确立了断页、过针、裁眉、折页、吹配、齐栏、点粘、定型、光边、上护板、粘签、装函套等一套完整的经书装帧工艺流程。最终，一共刷印了80部。

每部经书都体量巨大。在陈列室里，记者看到，这里摆放着一套完整的刷印、装订完成的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经书，占据着长18米、高2.7米的一面墙。

“《清敕修大藏经》经板数量众多，保护项目工程浩大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今后的工作。”韩崇起说。



后期装帧 叶晓楠摄

惜哉《墨子》

王兆军



品味古籍

在法家崛起以前，墨家是和儒家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，被时人并称为“孔墨显学”。

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，他的思想共有10项主张：兼爱，即治国者应“兴万民之利，除万民之害”，提倡无差别之爱；非攻，即否定非正义战争，肯定正义战争；尚贤，主张“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”，应唯贤是用；尚同，即“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”，达成社会的统一；节用，即节约财物；节葬，即反对奢侈的丧葬；非乐，即反对当权贵族的“繁饰礼乐”和“靡靡之音”；天志，即把一切自然现象看成是上天爱人的表现；明鬼，墨子以有人“尝见鬼神之物，闻鬼神之声”，从而得出“鬼神之有”的结论；非命，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儒家的命运论，认为“执有命”是天下之大害。

墨子死后，弟子收集其语录，完成了《墨子》一书。他的信徒组织了一个墨者行会。这个行会里的成员虔诚地秉承墨家的思想传统，躬耕陇亩，身体力行。这个行会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。墨家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，其领袖被称为“巨（钜）子”。巨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转让的，而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，墨子的徒弟、守住宋城的禽滑釐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。墨家的成员都称墨者，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。墨者大多来自社会下层，从事农业和工艺制造，主要职业是教师、工匠等。他们吃苦耐劳，平时一律短衣草鞋，“串足胼胝，面目黧黑”，以劳动吃苦为高尚之事。他们勤于实验，作战勇敢。

墨子及门人尽力为人们做好事，功成不受赏，施恩不图报，行仗仗义，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《淮南子》记载：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刀，死不还踵。”后一句的意思是至死也不调转脚跟向后。墨家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。战国时，秦国有个墨者巨子的儿子犯法，秦王顾念巨子年老而饶恕了他儿子，但巨子却以墨者的律法将儿子处死了。

后来的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，而是一个学术团体，他们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：完成学业，四处游说，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任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。墨子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、高石子于卫、公高过于越、曹公子于宋……很有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味道。

墨子是一位教育家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、理、军、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，就是墨子在30岁前创办的。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史称“弟子弥丰充满天下”。

墨子的学说，即使以现代人的观点看，也是光鲜灿烂的，可是，这么了不起的理论为什么没能堂而皇之地延续下来呢？是其理论本身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认知，还是墨家子弟操作不当？战国后期，墨家的信徒们逐渐转化成两支，其一为秦汉社会的游侠，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、逻辑学、数学、光学、力学等方面的研究，逐渐远离或者说从后来不曾成为政治的中心力量。



墨子

《文明的度量：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》（中信出版社出版）的作者伊恩·莫里斯（Ian Morris）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、斯坦福大学历史和古典文学教授。莫里斯将本书与他的另一本书——《西方将主宰多久：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》视为姊妹篇，我倒是觉得，本书更是对前书论据的补充。

前书中，为更直观地比较“西方”与“东方”1.5万年来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和文明程度，莫里斯独创了“社会发展指数”，即结合考古证据、历史数据、现代社会数据等，制定了能量获取、社会组织、战争能力、信息技术等4个“技术性指标”，对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描，最终得出结论：近200年来“西方”之所以一直领先“东方”并主宰世界，地理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莫里斯认为，在过去200年里，“西方”之所以超越“东方”主宰世界，是因为其有地中海发达且廉价的海上交通，方便周边居民广泛进行交易，传播先进生产力。相比之下，虽然郑和七下西洋，远渡非洲，但因为明朝无法制造横渡超过两个大西洋之长的太平洋的船舶，所以注定不可能赶在“西方”之前发现美洲新大陆。



莫里斯的研究无疑十分有趣，不过我们还应看到，人类文明的发展纵然受到地理因素的严重影响，但绝大多数时候更像是多种因素产生聚合“化学反应”的结果。远的不讲，近百年来，日本通过“脱亚入欧”进入发展快车道，东南亚也在融入世界进程中实现快速发展，中国更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保持不低于8%的高速发展速度。较于历史，地理条件没有显著改变，唯有变化的是，这些国家改变了过去封闭状态，在敞开门拥抱世界后才迎来了大发展。

莫里斯之所以建立“社会发展指数”，主观上是希望将过去一直纠结于定性的“宏观”争论逐渐引导到定量的“微观”分析。他认为这样的分析基于那些值得信赖的数据，结果可能更科学。不过莫里斯的数据分析模式，必定直面所有大数据研究同样无法回避的追问：“社会发展指数”为什么仅限这四种指数而没有包含其它更多内容？这样的取舍是否基于作者方便统计总结等因素？样本选定和判断标准会不会直接影响数据结果走向？

在《西方将主宰多久：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》一书最后，莫里斯写道：“那些批判本书的学者，即提出四大异议的人，应该想出自己的测量方式。也许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真正的进步。”显然，这并非桀骜不驯的挑衅，而是一位致力追求学术本真的学者的学术精神的自然流露。这种欢迎争辩的学术态度，远比我们常见的一团和气和交口称赞的学术氛围有益得多。